

新街战斗：新四军鄂中第一大捷

1939年，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成立后，深入豫南、鄂中，积极抗击日军、打击敌伪，逐步创建根据地。1939年10月13日，在李先念等人的直接指挥下，新四军在湖北省京山县的新街歼敌百余人，取得了挺进鄂中以后的第一场大捷，极大地提升了我军的政治影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煞敌邪 振军威 唤醒民众”

鄂豫皖等地深处敌后，是我党开展游击运动的重要革命根据地。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后，党中央决定开辟中原敌后战场，发展抗日武装。在该方针的指示下，李先念等人前往河南组建鄂豫边区党委，结合鄂豫边区对敌斗争形势，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并向武汉外围挺进。1939年5月，日军发动襄东战役。为牵制日军，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中原局决定派李先念南下应山、安陆，以至应城附近开展游击战争。其间，日军相继侵占桐柏、唐河、新野等县，意图经南阳向西安或洛阳进攻。基于此，时任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指示鄂豫边区要进行战争动员和发动游击战，并要以建立党领导的武装部队为中心任务。

随后，李先念通知应山县的抗日武装来到安(陆)应(山)孝(感)三县边界地区的中心集镇赵家棚，将部队整编为新四军挺进团，下辖三个大队。其中，一个中队去中和乡，巩固和发展已有的抗日根据地；二大队和直属中队在赵家棚开辟根据地；李先念等人则率领其余部队去京山大山头一带与中共鄂中区委领导的“应抗”会合。会师后，李先念等人组织召开鄂中区委扩大会议，商谈公开打出新四军旗帜，将鄂中、豫南的武装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下辖四个团队，李先念任司令员。

彼时，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倒退的政治空气日益浓厚，群众情绪极为低落，到处流传着日军如何厉害的说法：什么日本人头上戴着一个不锈钢锅(钢盔)，身上背着一个猴子脸(防毒面具)，手里拿着一支大盖枪(三八步枪)，脚穿一双带刺鞋(皮靴)，还有千里眼(望远镜)、顺风耳(电话机)、地乌龟(坦克)，简直就像“神兵”一样。李先念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决定以武装抗日的实际行动来“煞敌邪，振军威，唤醒民众”。

倒“品”字形布防 坚决反击来袭日军

1939年7月，李先念首先率游击支队一团队向东挺进，来到湖北孝感以西10公里处的襄(阳)花(园)附近。在这里，第一团队巧设“口袋”阵伏击了日军的运输车队。此后，又消灭了应城顽伪两面派李又塘部，使得赵家棚周边成为鄂中抗日根据地较为稳定的地区，司令部、鄂中区委机关等设在附近安陆县城的大山头一带，第一团队则设在刘家冲新街一带。

新街，全称刘新街，位于湖北省京山县的东北角，是一处四五十户人家的小集镇，有一圈土墙包围。墙外有壕沟，其西是宋河镇，西南是罗店，东南是蔡店，东北是雷公店，均为日军据点。为了支队和区党委等首脑机关的安全，第一团队团长张文津、政委周志坚决将一大队驻扎在新街西北杨家

医治了不少人的“恐日病”

日军伏在新街周围，却始终攻不进去。天亮以后，日军集中全部火力的冲锋均被打退。李先念指挥第二团队增援后，要求“一个营打敌侧翼，一个营上高山，防止敌人逃跑”，试图全歼敌人。此时，张文津指挥一大队和二大队分别从西向南和东向南发起对日军的攻击，基本形成对敌三面包围之势。战斗激烈时，许多群众被新四军视死如归、血溅疆场的精神感动，纷纷冒着生命危险上前支援。日军为摆脱包围圈，便在战场上释放毒瓦斯，我军战士简易防护后继续奋勇拼杀。在我军的还击下，日军被压到新街南寨外黄氏祠堂旁的洼地里，两边的伪军更是被冲击得四散而逃。至黄昏时分，被围困的日军伤亡惨重，一边佯攻，一边焚毁尸体。少数残敌从小路落荒而逃，战场上还丢下了来不及焚烧的20多具尸体。

尽管战斗取得了胜利，张文津仍遗憾地对李先念说：“可惜了，太可惜了！没有将鬼子全部消灭，剩下几十个让他们跑掉了！”李先念风趣地说：“不要紧，我们在这里还是第一次打鬼子，让他们跑回去几个报丧也好嘛，也是给我们新四军宣传宣传！”

新街战斗前后历时10余小时，共打死打伤日伪军18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新街战斗

面对此情此景，内心满是愤怒和仇恨，要同日军决一死战。周志坚一个箭步跳到路旁的石头上，高声喊：“乡亲们，莫乱跑，我们一定能打垮日本鬼子，你们不要怕，先躲一躲。”张文津拍着胸脯向人群高喊：“乡亲们，我是团长，我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打垮。”张文津、周志坚一面指挥战斗，一面组织群众转移，并派通信兵汇报大山头的支队司令部。

面对来袭的日军，李先念得到消息后，当即说：“打，坚决地打！”随后又带领刚从豫南到达鄂中的第二团队二大队火速赶去增援。在听取周志坚与张文津的简要汇报后，李先念坚定地说：“这一仗必须打赢，打输了或打一个平手都不行！中原人民都在盼望我们新四军的战报。”

是李先念率新四军挺进鄂中以后，在敌人的近后方给日军的一次重击，使新四军威名远播。战斗结束后不久，国民党五战区的《阵中日报》就发了特大号外，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劲旅激战新街，重创日寇，击敌数百”的消息。新街战斗的胜利，灭了敌伪的威风，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胜利医治了不少人的“恐日病”，大大振奋和鼓舞了鄂中人民的抗日志气。

(据《学习时报》)

读史忆人 典故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张十分特别的老照片——一棵大树布满整个画面，树上、树下，或坐或站着12人，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除了树下的小女孩外，其他11人都是八路军，可以说这是一张“抗战全家福”。

一张合影镌刻抗战记忆



照片中站在树下最右边的中年男子名叫王正南，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8分区7团参谋长。1935年，王正南考入黄埔军校第12期，毕业后在国民党部队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1939年，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王正南，毅然脱离国民党部队，回到家乡山东肥城，组织起近百人的抗日武装，时称二区游击大队，并担任大队长。

1939年7月，王正南率部加入八路军。随后该部改编为县独立营，王正南任营长。1940年，王正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县独立营补充到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他任旅政治股股长。1942年，王正南任冀鲁豫军区8分区教导大队队长。之后，他参加了1943年“9·17”和“10·12”反扫荡战斗。

在王正南的倡导和带领下，他的叔父王维涛，兄弟王正梅、王正兰、王正珠、王正菊，堂弟王正福、王正堂，表弟高立为、赵传银等10余人相继参加八路军。1944年春，王维涛、王正南叔侄兄弟等相继来到范县休整，一家人为抗战常年奔波在外，难得相聚这么齐全，于是就在门口的大枣树上拍摄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1944年，王正南任冀鲁豫军区8分区7团参谋长。1945年，他任8分区参谋长，参加了解放东平、巨野等战斗。由于军事素质过硬，王正南是8分区的传奇人物。他射击、刺杀、格斗、投弹样样精通，多次在8分区举行的军事体育大会上公开表演。1945年，在攻打阳谷的战斗中，部队进攻一时受挫，敌人自恃城墙工事坚固，在战场上向八路军大声挑衅。王正南一人持枪，两名战士往枪膛压子弹。他瞄准城墙射击孔连续射击，封锁敌人的6处射击孔，使我军顺利攻克敌阵地。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广大群众踊跃参军参战，保卫自己的家园。王正南家族10余人参加八路军，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保家卫国精神的缩影。2016年11月，王正南的家人将这张保存了72年之久的合影照片，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据《中国国防报》)

拾遗

细说古代“籍”和“贯”

提到籍贯，我们自然会想到一个人的出生地，但是，“籍贯”一词在古代并非单指出生所在地，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意义表达。古代的籍贯是分开的，籍是指“役籍”，贯则是“乡贯”，倘若把“籍”和“贯”合在一起，则表示两层含义，这与现代人对籍贯的理解大相径庭。

“役籍”是指一个人从事的工作类型，也就是行业属性。比如，木匠、铁匠、泥瓦匠之类的手工劳动者的“役籍”应为匠籍，而在政府部门上班的非现役公职人员的“役籍”则属于官籍，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普通老百姓只能是民籍。也就是说，古代的“籍”代表的是个人职业，或者缴纳徭役的种类，而与出生地没有丝毫关系。

古代的“贯”又称“乡贯”或“里贯”，指的是一个人的出生所在地，与现代人对“籍贯”的解释意义相同。如《隋书·食货志》中记载：“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意思是说，不是本地出生者不能编入本地户籍，这种管控措施显然要比今天的户籍异地迁移更加严苛。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诗作《新丰折臂翁》中说“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其中的“贯”就是指出生地。

由此可见，在古代倘若把籍贯作为一个词语，表达的是职业和出生地两层含义，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古代文化的精深广博以及古人在遣词造句中表现出的精妙和严谨。(据《西安晚报》)

陶行知写打油诗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平生为人正直，语言幽默，而且还擅长写打油诗，他写的打油诗，俗中有雅，雅中有俗，说理透彻，十分耐读。

陶行知在美国留学时，和胡适是同学。有一次，陶行知读到了胡适写的《我们走那条路》一文，胡适在这篇文章中谈到当时的中国有五个“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大社会现象，却没有说到当时在中国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这个最大的“鬼”。

读了胡适的这篇文章之后，陶行知感慨很多，觉得胡适的文章写得并不完美。于是，他立即写了一首打油诗给胡适，真诚而明确地指出了他文章中的疏漏。

陶行知的这首打油诗写道：
明于考古，昧于如今，
捉住五个小鬼，
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这首打油诗既肯定了胡适文章的优点，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文章中的最大的不足，非常巧妙，非常诚恳，而且立场和观点也非常鲜明，很有说服力，能让人在微笑中乐于接受。

陶行知和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交情深厚，是好朋友。翦伯赞喜欢抽香烟，而陶行知却不喜欢，所以，当别人赠给陶行知香烟时，他常常将香烟转赠给翦伯赞。

有一次，一个美国朋友送给陶行知一支好香烟，陶行知用纸将这支香烟小心翼翼地包好，让人送给翦伯赞。翦伯赞打开纸包，不仅看到了香烟，还看到了陶行知附上的一首打油诗，这首打油诗是这样写的：

抽一支骆驼烟，变一个活神仙，
写一部新历史，流传到万年。

陶行知用通俗简洁的语言，轻松幽默地表达了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问候，以及希望翦伯赞能在历史研究方面取得更大成绩的殷切期待之意。

(据《人民政协报》)

心平无险路

开元五年(717)，唐玄宗把宰相宋璟找来，交代他一件私事。

玄宗的孩子多，给皇子起名字、给公主起吕号颇费脑筋，于是，他就把这事托付给了宋璟，让宋璟各取30个备用，临了，他又特别嘱咐说：“你在这30个之中，单给我想一个漂亮的名字和一个漂亮的吕号，要与众不同才好。”原来此时他正宠爱武惠妃，心里非常喜爱和她生下的小皇子和小公主。

宋璟一听，眉头立刻皱了起来。他说：“陛下，您既然当了皇帝，心就一定要公平。现在您让我单独想一个好名字和一个好吕号，可见您的心已经不公平了。您之所以对孩子不公平，当然是因为孩子们的母亲有的得宠，有的不得宠。您宠爱哪个妃子、哪个孩子，这是您的感情问题，我管不着，但是，感情不能妨害规矩，不能破坏制度，否则宫廷内就会有纷争，国家也不会安宁。”

玄宗一愣，进而陷入深思之中。是啊，很多时候我们处事不公，是受到情感好恶的影响，心不平，一碗水何止会洒，甚至会有倾覆的危险。

宋璟说得对，做得更好。

开元七年，朝廷一年一度的选官工作又开始了。官员当时是一种稀缺资源，僧多粥少，竞争自然异常激烈，那些候选官员不甘落后，想着法子把自己推销出去。有一个叫宋元超的人就找到吏部，声称是宋璟的叔叔。言外之意，当朝宰相是我侄子，你们看着办吧。吏部的官员一听，没敢怠慢，马上运作起来，眼看事情就要办妥之时，恰巧此事让宋璟知道了，他赶紧给吏部写了封公函，说：“宋元超确实是我的远房叔叔，他常住洛阳，我常住长安，所以平时也没什么往来。本来，如果他不把身份暴露出去的话，我就听任你们秉公办事了，你们该留则留，该放则放。可是现在他既然已经说出了和我的关系，那没什么好说的，只能是冤枉过正了。不管他资历才干是否符合条件，一定要让他落选。”

在唐朝，宋璟的官当得特别硬。武则天的内宠他敢拒，睿宗的胞妹太平公主他敢反对，玄宗的旨意他敢违抗，他的政治生涯虽经三起三落，但却历经四朝不倒，可谓罕见。

清人申居郢在《西岩赘语》中说：“居心平，然后可历世路之险。”意思说，公正无私，才能不怕人生道路之艰险。这或许就是宋璟为政处世的秘密吧，难怪唐玄宗在赐给他一双金筷子时说：“非赐汝金，盖赐卿以箸，表卿之直耳。”

(据《天津日报》)

关羽，在中国人心中，是关公、关圣、关帝，是保护神，是仁、义、礼、智、信等美好品德的化身，数千年来备受海内外华人的推崇和敬仰。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关羽究竟如何呢？

关羽(约公元160年-219年)，生于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良(今山西运城)人。关羽年轻的时候杀了人，东躲西藏，隐姓埋名跑到涿郡，《三国演义》里说他在涿郡卖豆子，其实他是卖枣子。时农民起义蜂起，黄巾军席卷天下。刘备在老家招兵买马，想乘乱世起事，关羽就是在这个时候和杀猪的张飞投靠刘备的。三个人同食同寝，恩若兄弟。关羽随刘备一路拼杀，直至建立蜀国。关羽暂居曹操手下时，因阵前杀颜良解白马之围有功，由曹操上表封为汉寿亭侯，也就相当于县知事而已；刘备称汉中王时，拜关羽为前将军，总领荆州地区行政。公元219年战败被俘，关羽被孙权斩首。直到41年后，关羽才被刘禅想起，追封了个“壮缪侯”，此后不久，蜀汉灭亡。

那么，关羽何以成为神话人物，成圣成帝，被万人跪拜千年而香火不绝？我查了三个原因：

其一，封建统治阶级故意抬高关羽，以愚弄人民，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开始时，统治者并未发现关羽的利用价值，直到他死后几百年的唐代，事情才有了转机。武则天当政时开设武举，唐朝开始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公元782年，朝廷以孙宾、廉颇、卫青、霍去病、关羽、张飞等六十四名将弟子从祀，关羽的称号是“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和张飞一同入选武圣人姜尚庙。令人郁闷的是，姜太公和十哲面前有酒有肉，关羽只有站在旁边干看的份儿，直到五代后唐时期，关羽等六十四人的画像前才有了祭品。宋代以后，关羽便被带上“武圣”的桂冠。关羽，被宋徽宗连升三级：先封“忠惠公”，再封“崇宁真君”，又封“昭烈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元文宗封关羽为“壮缪义勇

武安显灵英济王”。万历十八年，神宗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晋升为“帝”的臣子，相比之下，孔子再怎么被加封，也始终是个“素王”。万历四十二年，在道士的游说下，关羽又被神宗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新封号让关羽在道教的地位超过张道陵、吕洞宾、丘处机，直追太上老君。清朝统治者对关羽更是崇敬，称关羽为“关玛法”，“玛法”意味“祖”。顺治元年，刚一人关的清廷就重修关帝庙；顺治九年，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这一封号意义非凡，冲淡了万历封号的道教色彩，突出了“忠义”这一儒家伦理。从此时起，关羽便被称为“武圣”，关庙也被称为“武庙”，并且与文圣孔子一样，武圣关羽被列入清代国家级圣人之列，享受正式的祭祀。到了光绪五年，关羽的封号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武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长26字，和历代“大行皇帝”相比，仅少于努尔哈赤一字。

其二，小说《三国演义》和儒家的神化。关羽之所以被神化，除封建统治者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外，小说《三国演义》和儒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小说《三国演义》里，写他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斩车胄、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都是违背史实的。至于他手使的青龙偃月刀，就更不存在了，因为在当时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冶炼技术。早在北宋年间，一些文人就对关羽身上的“忠义”这一儒家特征进行了挖掘和创造。宋儒褒扬《春秋》，关羽喜读《左传》的特征又大得士子们的好感。在元代，有关三国故事的杂剧三十

关羽何以成圣成帝



多种，而标题中有关羽的就占了十一种。在元剧里，关羽的戏比三国其他任何人物都要多。

其三，民间的推崇。关羽，在中国被推为几乎与孔子齐名的武圣人，在民间金身无数、香火绵延，可见其在中国老百姓心中的地位。明中叶起，关羽开始在科举考场频频“显灵”，有考前给举子开小灶讲《春秋》的，有托梦给考生漏题的，还有考场着火救考生的……种种神异，不一而足。而关庙更是遍布天下，据统计，清代中期仅北京城内就有关帝庙116处，远远超出了孔庙的数量。当时全国约有关帝庙30余万处，而同期全国只有孔庙3000处。近代以来，海外华人更是把关庙建到了海外。民间拜关羽为“祖师爷”和“保护神”的行业也多如牛毛：剃头、描金、皮革、烟草、香烛、成衣、酱园、豆腐、屠业、典当、武师、教育、命相，并且司命禄、佑科举、护钱财、治病除灾、驱邪避恶……

就这样，在封建统治者、儒家和民间的“互动”下，关羽就成了神化人物，至今不衰，香火绵延。

(据《西安晚报》)